

雙語創作、翻譯與中西文化交流

——對加拿大華裔雙語作家李彥的訪談

■余小梅

安慶師範大學

□李彥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1. 文學創作

■：李老師，您好！作為跨國中英雙語作家，長期以來文學創作是您促進中西文化理解和交流的一個主要方式。2009年您出版的第二部英文長篇小說 *Lily in the snow* 就是很好的見證。作為眾多讀者之一，我感到這是一部很寫實的作品，在時間上歷史和現實完美交融，在空間上加拿大和中國似乎變得極為緊密，尤其是作品插述了白求恩醫生在中國備受尊重的事實，有力證明了中國和加拿大人民之間的友誼世代相傳；作品對以主人翁為核心的不同年齡和國籍女性的愛情憧憬、家庭境遇以及從未放棄對理想追求的描寫敘述尤令讀者印象深刻。作品反映出異國生存的艱辛挑戰，但華裔移民在北美異域展示出堅韌不拔的特性。因此，作品的命名 *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我覺得應該是有這方面的寓意，能否請您談談這部作品標題的選擇和內涵？

□：雪，代表寒冷的世界，隱喻加拿大的自然

摘要：對作家李彥的訪談分為文學創作、翻譯和中西文化交流三個部分。始自作品人物命名的寓意討論，重點探討多部小說裡詩歌引錄，揭示出以李彥為代表的海外作家文學創作與中國古典文學「詩騷傳統」的關聯，由此反映出中國古典文學抒情傳統對華人華裔英語小說創作即中國文學對中西文化生成的影響。同時談及目前海外華人華裔英語小說創作的困境和在世界文學舞台贏得一席之地的前景。作為優秀譯者，李彥以切身翻譯實踐案例說明跨文化交際中需要注意使用有效翻譯技巧以避免文化交流中的歧義誤解。訪談還關注何種創作能夠有效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拋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狹隘思路，在文學創作和翻譯中融合優秀中西文學文化元素實現中西更好溝通的可能性。

關鍵詞：加華作家李彥雙語小說創作與中國詩歌；翻譯；更好的中西文化交流

環境；百合花，除了象徵聖潔的心靈，也有基督教涵義。《聖經》中提到過百合花。在冰雪中生存的百合花，其意不言而喻。

■：的確，“Lily”一詞多次出現在《聖經》裡，如第二章“I am the rose of Sharon, the lily of the valley”，第14章“He shall blossom like the lily and strike root like Lebanon”等。Lily被定為書中核心人物之名，在濃厚的基督教文化語境裡較容易在西方讀者中建立起某種共情，無疑有利於贏得西方讀者的名字似乎也印證了

這一傾向，如母親的名字“Grace”，“grace”一詞在《聖經》中出現了數十次。其他人名也很獨特，如 Unicorn, Jade, Camellia, Rice, Beaver-teeth, Mouse-colonel，不僅賦予人物有關動物或者事物普遍的形象屬性，且自帶諧趣。從中可以看出您對作品在西方讀者中的有效接受做出過嚴肅的思考。

□：採用這種方式給人物命名，主要考慮到



人物繁多時，會給讀者帶來困擾。我曾經感到不解，為什麼中國的傳統章回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西遊記》裡面，動輒幾百個人物，中國讀者從不感到人物繁雜混亂，而我用英文創作長篇小說時，四十幾個人物，出版社總編就感到人物太多了？

自從投入漢語教學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漢字本身帶有圖畫，意象鮮明，協助了讀者記憶，此外，傳統小說中，對於比較抽象的姓名，還特意採用了綽號的方式，賦予人物特徵，例如「浪裡白條」、「美髯公」、「黑旋風」等，都是為了幫助讀者區分眾多人物。

在我的英語創作中，如果使用了帶有鮮明意象的詞匯命名每個出場人物，會自然而然加深讀者的記憶。這一點技巧，顯然是奏效的，得到了肯定。

加拿大溫莎大學英文系主任昆西教授 (Dr. Katherine Quinsey) 2010 年時讀完《雪百合》後寫信給我：「你給書中人物命名時採用的方式，效果極佳。這實際上發揮了兩種語言各自的長處。小說雖是用英文撰寫的，我卻能感覺到裡面含有中國韻味和思維習慣，使得小說的敘事本身攜帶了女主人公繼承自兩個世界的兩種文化。這種風格使得讀者在閱讀時不由自主地也同時採用兩種語言來進行思索。非常獨特、生動有力。你在運用幽默時也一樣。通常，不同文化對幽默會有不同反應，但你這部小說中的幽默卻做到了在不同文化的讀者身上均能產生效果。」

■：看得出您對作品和作品人物的命名本身就帶有跨文化交流的意圖，不僅能夠讓讀者過目不忘，還能促進中西讀者增強對他者文化的理解。即便是 2013 年書寫移民的作品《海底》中，人物都是以海洋生物如珊瑚、江鷗、藍鯨等名稱命名，這也能激發全球移民對於生存境況的同理共情之呼應。這些名字或反映了西方盛行的宗教文化或反映因名而發的人類普遍認知。從中可以看出您採取的是一種具有包容性、融合性、共通性的創作策略，不同於某些華裔作家採取的排斥性、貶中讚西的非此即彼視角或一味地利用強化刻板印象的異國情調。

您作品另一個特點突出了中國詩歌。讀者不難

發現您作品裡較多的詩歌引錄尤其是中國詩歌的引錄。《雪百合》中的母親在青年時代暗戀的高中英文教師會吟誦詩歌，而女主人公與 Majesty 相識之初，兩人小酌吟詩，比賽的便是《毛澤東詩詞選》，所以，我好奇中國詩歌是否已經融入了您的文學血脈裡，常會於無意識中顯露出來？如果是這樣，您對哪些中國詩歌印象非常深刻？而您和中國詩歌的接觸，是像很多中國讀書人一樣，緣於幼年時曾有過被要求背誦古詩的經歷？還是自己對詩歌的愛好？中國詩歌對您整個文學創作是否有影響？您在什麼創作情況下會引用中國詩歌？

□：我幼年時，沒有人強迫我背誦唐詩宋詞。那種喜愛，是天然的對美的東西的欣賞。對詩歌的興趣，是成長中自然形成的，當然，也不排除基因的影響。我母親年輕時，是個喜歡幻想、充滿浪漫情懷的人。我在英文版《紅浮萍》裡描寫過，她在大學中文系三年級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在歡送新兵入伍的大會上，她即興作詩，登台朗誦，「朋友，請伸出你的手，我要與你告別，去參加戰鬥！」六十年代，我剛上小學，最早接觸到的詩詞是剛剛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記得某個星期日的黃昏，母親帶著我沿街散步。那時的北京，街頭行人稀少，白楊樹葉在微風中沙沙作響，歲月靜好。母親邊走，邊教我誦讀，「歲歲重陽，今又重陽，遍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我雖初學識字，但已能感受到中國詩詞的美麗意境了。少年時代，正處於對閱讀的饑渴期，但那些年，可以讀到的書卻很少，翻閱母親書架上的唐宋詩詞選，也瀏覽過《魯迅全集》中的一些詩作，但僅停留在不求甚解的水平上。譬如「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青年時代，讀了陳毅的《梅嶺三章》，深感觸動。新詩我也喜歡。記得朋友送給我一本賀敬之的詩集，我至今能背誦《回延安》中的一些句子。

這種青少年時代潛移默化的影響，無疑也融入了我的寫作中。用英文寫作時，當試圖描寫某種意境時，我腦中常會湧現出中文的詩詞來，甚至包括樸素無華卻生動活潑的陝北民歌。於是我便嘗試把這些漢語元素融入英文寫作之中。你閱

讀了《雪百合》，裡面有一首陝北民歌《想親親》。但我根據英文的韻腳需要，改編了一些詞匯。這是我在「自譯」時常常採用的方式。

■：《想親親》這首民歌在《雪百合》裡出現給讀者一種極為親切的感覺，主人翁在加國旅館當清潔工，雖然受不了令人沮喪的氣氛，但想到很快就會結束這份工作，開始新的人生展望，抑制不住內心的愉快，情不自禁地在旅館走廊裡唱起了這首陝北民歌。主人翁作為帶著嬰兒的單身母親，在加拿大求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艱難；為了謀生，不斷地尋找適合自己特長的工作機會，但屢屢失敗，所能得到的就業機會多為服務性體力勞動，工資極低，且繁重、枯燥。但華裔新移民繼承了自己傳統文化的勤奮努力、堅韌不拔的精神，雖身處逆境，卻永不放棄信念，這種「白日放歌」的自我療傷模式，可說是典型的中華文化特色。在作品第17章，Lily和Majesty兩人應聘給Deer Valley一戶獨居老人做家政和園丁時，對這座白雪覆蓋的山谷中的別墅裡的家庭圖書館、古色古香的家具等相關設施一見鍾情，因為那些蘊含著文化氛圍的東西，令他們想起了自己曾經擁有、親切熟悉、卻已遠在天涯的故國文化，而在異國他鄉的未來卻前景渺茫。惆悵中，二人不由自主地唱起了長征組歌中的《過雪山草地》：The snow-covered wildness stretches with no end. Food has run out in the freezing highland. The Red Army soldiers are iron men refusing to bow to the snow-capped mount.....Wind and rain soaked our thin clothes, but forget our bones stronger. Wild herbs filled our empty stomach, yet nourished our will.....^[1]對比原文，雖然詩歌韻律、形式等因素為了適合英文讀者的思維，經過再創作，與原文有出入，但這裡蘊含著主人翁對故土的懷念，更抒發了立志在新家園生存發展的華人移民不畏艱難的自我激勵之情。

□：我在英文書中多次描寫過這種即興放歌的場景，不但源於生活，也是為了真實地展現中國文化有別於西方文化的一個特色。在《雪百合》中，主人公的母親曾滿懷深情地背誦了一些高中時代的英文教師當年寫給她的詩歌。沒想到，她已經步入人生暮年了，仍能默誦如初。我把那些詩歌稍

加改造，也翻譯成了英文。

■：正如有學者對中國古代小說和詩詞的關係評論時所指出的，「能夠寫作、欣賞詩詞，是一個人的學問、才華、修辭等各種素養的綜合反映。」^[2]小說裡融入詩詞，我想既是母親晚年借詩抒情，又能刻畫出母親的詩性情懷，同時也成為作品塑造母女兩人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有力支撐。

□：我在中文小說《海底》中，也在很多地方引用了毛澤東詩詞的名句，藉以襯托主人公的成長背景和眼下的心境。我在非虛構文學《尺素天涯》、《何處不青山》（注：二者合編入了《不遠萬里》一書中），也引用了一些古詩的意境。在我新創作，2022年出版的非虛構文學《蘭台遺卷》一書中，也同樣引用了很多古詩詞。例如納蘭性德的名句，「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我感到，中國詩詞的凝練、精闢、優美，非常適於表達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緒。這是英文無法替代的。當然，我在英文寫作中引用中國詩詞，也是希望能通過我的翻譯，使英文讀者能夠領會到中文的深邃美麗。我想，這點我是做到了的。

《加拿大文學評論》2010年刊登了加拿大法裔翻譯家Michelle Tisseyre的評論：「李彥的寫作風格十分獨特。同時使用英文和中文兩種語言寫作，產生了一種神奇的煉丹術般的效果(mysterious fusion-like process)，極大地豐富了書中的意象群和韻律感(images and cadences)。毫無疑問，她那種帶有共鳴的聲音，來自於中文韻味，即便她用英文寫作，也充盈著那種古老語言所攜帶的率真(boldness)、力量(power)與優雅(elegance)。」

■：您作品引錄詩歌不僅增加了小說的詩性優雅，也彰顯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特色。與Michelle評論類似的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也有一個觀點：小說中高水平的詩詞可以提高小說的品位，可以雅化某些內容。引詩入文使得小說具有了韻文和詩化的氣質，對於小說裡這種引詩入文、詩化意境，中國學界基本達成一個學理性的共識，即：中國文學有著一個悠久的「抒情」傳統，以學者陳平原的話來說是「詩騷傳統」，「詩」即《詩經》，「騷」即《離騷》，被視為這一傳統的源頭；魯迅、汪曾祺、沈從文、格



非等國內一大批作家作品也被認為承繼了這一傳統。所謂「詩言志」、「詩緣情」，請問您是否注意到這個文學傳統，或者不自覺地在雙語創作中傳承著這個傳統？

□：雖然中國詩詞對我來說，是一種潛移默化中的影響，但我覺得，我後來是有意識地在英文和中文作品中展現中國詩詞的意境。這可能也與我在加拿大高校任教幾十年的經歷有關。從一開始用英語講授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概述這些課程，到後來專注於思考，如何讓非華裔學生有效地掌握漢語這種難度較大的表意文字。這一過程，使我個人也充分體驗到了漢語的特性。所以無論在自創的漢語教學手段中，還是在文學創作中，我都開動腦筋，想方設法，試圖讓其他文化的族群也能與我們一樣，充分認識到漢語的魅力何在。

■：作品是傳統的載體，傳統是作品的提煉。文學傳統包括了創作手法，引詩入文成為除了您，還有裘小龍、哈金等在海外高校任教的華裔英語作家大部分小說敘事採取的手法，裘小龍曾明確表示中國古典小說對他偵探小說加入詩詞的影響，他的原話是「中國古典小說裡面是有詩歌的，所以我的小說裡面加入詩歌，這個也算是一個發揚傳統吧」^[3]。因此，除了作家個人對詩歌的熱愛之情外，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這是通過閱讀中國古典小說受到了其影響的結果，可以說引詩入文這一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對不少高知華裔作家創作發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種不爭的事實。能否請您談談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對您的影響？

□：我是小學四年級時離開北京去黑龍江大興安嶺林區的。在鄰居家裡，第一次讀到了《紅樓夢》，似懂非懂，卻被其魅力深深打動。青年時代又讀了幾遍。起初只是著迷於那些優美華麗的辭藻和涉及人物命運的一首首撲朔迷離的詩詞。人過中年後，對那些詩詞中所蘊含的深刻人生哲理就有了進一步領悟，例如《好了歌注》。這些青年時代的閱讀，無疑影響到了我成年後的創作。幾年前，暨南大學有位學者易淑瓊博士，曾寫過一篇論文，專門分析《紅浮萍》中文版的語言風格，認為深受古典詩詞之影響。

易淑瓊博士在其研究中這樣寫到：《紅浮萍》中文譯寫本是一種與當今大多數文學作品中生活化、口語化書寫方式不同的書卷氣的典雅的書面語書寫。整部小說著意於以富含豐厚民族文化積澱的意象烘托營構出一方內具中國傳統審美「氣蘊」的唯美意境——「古典意味的中國境界」。典型地體現了「耽於意境」、「追尋辭藻、韻律、視覺的愉悅」之詩性語言書寫策略^[4]。

我個人的體會是，在採用中文創作時，由於從教學上獲得的體會，感受到中文與英文之間的巨大差異後，則往往會注重挖掘中文的韻律與視覺效果的特性，出現刻意追求排比、對仗的審美趨向，極易陷入文字表面的誘惑之中。

例如，譯寫中文版《紅浮萍》時，英文原文的結尾，本是簡潔流暢的素描，但用中文寫出來時，卻不由自主地落入了唯美的陷阱之中。中文行文如下：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出國前夕，最後一次去古城探望外婆。雖然二十多年未曾親近故鄉的山水，那裡的一草一木卻早已深植於我的血肉，常在午夜夢回時，輕輕叩擊我脆弱的心扉。

那裡的老屋燃起過外婆烹調美味的爐火，
 那裡的池塘曾蕩漾著母親吟詩作詞的碧波，
 那裡生長過琴姨栽種的蘭草，
 那裡殘存著棠舅敲棋的石桌。
 那裡遺留著我童稚的目光，
 追隨孤雁從長天飛過。
 當我再次踏上老街坑坑窪窪的青石板，
 我情不自禁一陣顫慄，哀嘆歲月的蹉跎。
 時光似乎被高高的秦嶺牽住了足踝，
 遲遲不肯邁過腳下肥沃的土地、奔騰的江河。
 古漢台角樓上生鏽的銅鈴在風中叮噹鳴響，
 我仿佛看見駐足高台上的少女，
 在落霞中苦苦等待江邊出現的風帆，
 在秋雨中翹首企盼永遠不再飛回的白鶴。^[5]

從上面的段落，你可看出古典詩詞對我的影響。情不自禁中，就把散文敘述寫成了韻律詩行。例如，「敲棋的石桌」，靈感源於《紅樓夢》中賈寶玉和遠嫁的妹妹探春惜別時所寫的詩句——「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污棋坪。」「追隨孤雁從

長天飛過」，「在落霞中苦苦等待」，則受到《滕王閣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啟發。「在秋雨中翹首企盼永遠不再飛回的白鶴」，靈感來自於崔顥《黃鶴樓》中的「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激情寫作時，往往可以體驗到早已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古典詩詞元素。

■：《紅浮萍》這一段譯寫把讀者帶入了無窮無盡的往昔追憶中，讓每一個離開了故園的遊子都心生思鄉的淚痕。多行最後一字的押韻賦予了小說充足的樂感，充分證明了您小說裡借古詩寫景抒情的能力以及對中國古典意境的追隨。

詩騷傳統源頭之一是《詩經》。旅美學界陳世驥指出：「《詩經》是一種唱文（詩者，字的音樂也）。」^[6]因此，詩和樂成為了抒情的重要載體。而您的作品裡融合了詩歌、民歌和革命歌曲乃至聖詩。這不可避免地給讀者一種濃厚的「抒情」風格，體現出一種中國和中國文人獨有的「詩性」氣質。但中國文學批評家認為相比發展完善的詩歌，中國文學中小說是滯後發展的文類，主要原因是過多的抒情阻礙了敘事。小說是敘事，詩歌要抒情，也適宜抒情，小說中引入詩歌，必定要影響敘事的節奏，您是如何處理小說創作中兩者的關係呢？

□：引用詩詞歌賦時，我會注意節制，避免喧賓奪主，影響閱讀的流暢。詩句必須與敘事情景息息相關，且不宜過長。此時，一兩句詩詞便能起到畫龍點睛的功能，勝似囉囉嗦嗦一大段冗長的抒情描寫。

例如，《海底》第43頁，描寫到女主人公在噩夢中受到奸佞小人聚眾欺凌，驚醒後滿腔悲憤，難以言表，僅引用了兩行詩詞：「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筆者注：毛澤東《賀新郎·讀史》）。又例，258頁，描寫女主人公的母親已步入老年，仍無法忘懷青年時代的高中教師。如何體現那種刻骨銘心的思念？此時用母親默誦初戀人曾寄給她的詩句，寥寥數行，讀者便了然於心——「十里長亭，離淚不能共灑。懇托長風，傳去萬千思念。」、「盼你的信，猶如長夜裡失眠的老人，等待晨星的出現。」^[7]

■：引詩歌入小說通過精簡引用詩行以達到控制抒情節奏顯然是有效的，給中文閱讀往往帶來一

種意猶未盡、留有空白之感。我覺得這在英文中折射出漢語表述含蓄卻意蘊深厚之特點。寥寥數句詩行，讀來真是感人，用語言細膩優美、視角新穎獨特、思想深刻等評語還不足以突出您作品裡情感厚重的份量。

2. 翻譯

■：一部作品凝聚了作家的大量心血，在我看來，以您為代表的雙語作家以及華裔英語作家可以稱得上完美的翻譯家，往往把原文翻譯得順暢生動有趣，體現出了原有的藝術魅力。再去品讀《雪百合》裡引錄的陝北民歌《想親親》時發現，您不是簡單地翻譯，而是採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使之較好地融入敘事中，包括學院派翻譯家一般不採用的策略：摘選要句翻譯、大幅度調整句序等，如：

表1. 陝北民歌《想親親》翻譯句序調整

民歌原文	譯文中句序
想親親想得我手腕腕（那個）軟， 拿起筷子我端不起碗。	(2)
想親親想得我心花花亂，煮餃子 下了一鍋山藥蛋。	(3)
頭一回眊妹妹你不（那個）在， 你媽媽劈頭打我兩鍋蓋。	(1)

您作品裡引錄的長征詩詞《過雪山草地》同樣採取了摘選的策略，略掉了某些句子。您剛提到，在翻譯時，對一些詞匯要進行改編，那麼請問在什麼情況下您會修改？或者說為了實現什麼樣的創作效果目的而修改？似乎翻譯中國詩歌對於您這樣的雙語作家而言是輕鬆的事情。您對中國詩詞一般是直譯還是意譯？

□：您抓住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我從事雙語創作久了，對自己的作品，是完全根據讀者對象不同而隨意處理的，譬如那首陝北民歌。原歌詞中「煮餃子我下了一鍋山藥蛋」。山藥蛋即土豆，在中國人的飲食中，屬於僅為填飽肚腹的低檔食物，但在西方人眼裡卻是美味適口的日常飯食，他們不會感到其中的幽默，於是我便把「土豆」改成了「大蒜」。「鍋蓋」，則改成了「飯勺」，也是出於同



樣的考慮。這樣處理之後，英文中不僅幽默，還更合轍押韻。但如果翻譯著名詩歌，我就不能隨意更改了。十幾年前，我們的老校長退休時，學校組織告別會，我曾帶領中文教研室的老師們一起演唱李叔同的《送別》，為了使同事們了解這首歌詞的意境，我特意把它翻譯成英文，發給了在場每個人，演唱結束後，我發覺每個聽眾眼中都淚光閃閃，顯然都被打動了。在這種類型的翻譯中，我的關注點就是如何採用最貼切的英文詞匯，反映出中文內涵，這時往往需要添加帶有「質感」的詞匯，代替中文詞匯中那些美麗卻虛無縹緲的內容。

表 2. 《送別》英譯文與原文

英譯文（李彥試譯）	原詩（李叔同）
Farewell, My Beloved Friend	送別
By the wooden pavilion along the old trail,	亭外，古道邊
Dyeing the sky green we saw endless meadows.	芳草碧連天
Breeze in the dusk blew up the willows,	晚風拂柳
disturbing the bamboo flute wail,	笛聲殘
And gentle rays of the setting sun shedding on layers of rolling hills.	夕陽山外山
Away to the end of the ocean	天之涯，地之角
and corners of the earth my beloved friends go.(...)	知交半零落(...)
A cup of rice wine diluting the sorrow,	一斛濁酒盡餘歡
in chilly darkness tonight, I will be dreaming of you.	今宵別夢寒

這首詩詞的翻譯中，我特別注意到增加「質感」、消除歧義的問題。例如，對「長亭」，我改造成「木亭」，因為在西方社會，亭子可以是磚石的，也可以是水泥的。「木亭」就增加了質感，使讀者理解這是帶有中國元素的亭子。「笛子」，也有西樂中的金屬長笛問題，所以就翻譯成「竹笛」這一帶有中國特色的樂器。「碧連天」，如果英文用「連接」這個字眼，缺乏美感，我就換成了「湮染」這個詞匯。還有「濁酒」，更不能直譯了，以免英文讀

者誤以為是不清潔的酒。於是我改成了「米酒」，避免了歧義，還帶有中國元素。「盡餘歡」，我覺得，如果直譯為「殘存的歡樂」，也不易被西方讀者理解，於是做了改動，英文就成了「沖淡憂傷」。

■：我想如果每一位從譯者都如此細緻地雕琢有關中國文化的譯文，將中國元素準確地釋譯出來，想必中國文化會在世界上更加容易、正確、廣泛地被理解和接受。

3. 中西文化交流

■：您在英語國家長期工作生活，您認為在當代，什麼中國文化元素融入到文學創作、文化交流會對西方人有吸引力？您一直積極參與中西文化交流，這些經歷對自身創作和翻譯產生了什麼影響？

□：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目的何在？人類精神文明各有千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我們不能設想去完全取代他人信仰。我的努力，是讓世界了解中國人民，消除誤解，求同存異。

在課堂上，我所面對的青年學子，基本上對中華文化知之甚少。也許有人聽說過「長城」，或「兵馬俑」。經典讀物，儘管圖書館裡有多種英文譯本，如《論語》、《道德經》、《易經》、《孫子兵法》，但感興趣者，如鳳毛麟角。涉及到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浩瀚歷史，自然應避免對牛彈琴。因此，化繁為簡的「掃盲式教學」，用趣味性代替枯燥條文，便成了有效的教學方法。我所採取的策略，是首先要建立起「認同感」。這樣才能與之溝通交流。目的是要把我們的觀念傳達給對方，使他們能夠接受我們的東西。

怎樣建立認同感，引起他人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呢？新聞學常識告訴了我們，人們感興趣的，往往是熟悉的人和事物。因此，我從西方人家喻戶曉的熟悉文化入手，用講故事的方法，對比人類在價值觀上的共性。

我曾選出中國先賢的名言，與西方人家喻戶曉的《聖經》名言做對比：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耶穌：待人如待己。

墨子：兼愛，非攻。

耶穌：愛所有人，包括你的敵人。

孟子：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不患貧，患不均。

耶穌：富人是進不了天國的。

在介紹文化習俗時，我刻意列舉了中國與西方在遠古傳說上的相似例子：女媧捏土造人與上帝捏土造人的創世；嫦娥偷吃不死藥與夏娃偷吃禁果；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子與亞伯拉罕殺子獻祭，等等。

相對於強調神性的西方文化，我對中華文化做了通俗易懂的簡明概括，貫穿中國歷史幾千年的儒釋道這三種主要信仰，滿足了人生的各種需求。儒家思想致力於闡述世俗成功之路，為人們提供了管理社會的知識；佛家思想潛心來世，滿足了人們的日常精神需求；道家思想強調融入自然，則滿足了人類追求長生不老的心願。

我組織過幾十次中外文化研討會。我認為，文學是向世界展示自己精神文明的一扇窗口。但有多少人對他人的文學感興趣呢？

一年一度在多倫多舉辦的「湖畔國際作家節」是北美規模最大的。2014年10月，我與組委會共同努力，首次設立了「中國專場」。前來出席的中國作協代表團隊伍裡，有茅獎得主、省文聯主席、著名評論家等文壇大腕，對當代中國文學做了介紹。然而，在場的非華裔聽眾，對這些作品一無所知，提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還讀林語堂嗎？」台上默然。種種跡象表明，中國人對世界文學名著的了解，大大超越了外國人對中國文學名著的了解。百年來，大量翻譯成中文的世界經典，使我們從少年時代起就接觸到人類文明寶庫中的精品。而大量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卻無法有效進入其他民族讀者視野。

問題何在？多重原因。但最深層的原因是，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太薄弱。尤其是經過長期的妖魔化運作，在輿論宣傳上處於劣勢的中國，根本無法要求別人接受你的文化，按照你的思維方式去欣賞中國文學。

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上，我見到了法國漢學家白樂桑(Joel Bel Lassen)。他與我探討這個問題時，曾批評說：「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自信，連自己的文化都罵。法國大革命鬧得那麼凶，我們法國

人也沒有罵自己的語言文化！」

由此想到，百多年前，中國人閱讀西方文化時，無論多麼艱澀、多麼不習慣，我們也全盤接受了。這反映了人們對強勢文化的盲目崇拜。只能期待著，中國文化強大到足以令別人想主動學習的那一天。

2018年我應邀回國，參加在北京組織的一場漢學家翻譯論壇時，注意到一個令人尷尬的現象。各國漢學家爭相翻譯的某些作品，並非中國文學的優秀代表作。大量的好作品，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當代的，卻未能有效地推出。這種現象是如何形成的？也許反映了盲目追求市場、迷戀國際獲獎所帶來的問題。然而，選擇什麼樣的「中國文學作品」推介，其實關乎到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形象。值得深思。

如何有效地使中國文學進入海外讀者視野呢？我與同事合編教材，用生動活潑、寓教於樂的方式，培養青年學子對中國文學的興趣。

從上下幾千年浩瀚的文學海洋裡，我們選取了一些中國古代優秀文學篇目，重點介紹有故事情節的，如《豫讓傳》、《荊軻傳》、《李娃傳》、《鶯鶯傳》、《中山狼》，以及《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選段。這些篇目不僅囊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如「忠孝節義」等價值觀，也反映了愛情觀。涉及到現當代的作品，有魯迅的《祝福》、張潔的《愛是不能忘卻的》、張承志的《黑駿馬》等膾炙人口的名篇。

至今記憶猶新的，是一位女生在宣讀她對魯迅作品的讀後感時，眼中晶瑩的淚花。學生們被優秀的經典作品所深深感動，可見人類情感的息息相通。另一位女生的學期論文，則令我大開眼界。她深入分析批判了崔鶯鶯在追求愛情時的攻於心機，對其使用各種手段「要挾」戀人，強求愛情忠貞不渝等行為，嗤之以鼻。這種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截然相反的觀點，無疑融入了現代人的婚戀觀。

教授中國文學課程的經歷，使我體驗到，人類在追求上面臨的大問題是一致的。對真善美的標準、終極目標也是一致的，即社會的平等、公正。但達到目標的手段卻不同，因此也影響到了文學



藝術的不同表現手法。

在我的文學創作中，我也通過藝術手段，融入了自己對中西文化對比後的深入思考。譬如2022年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長篇紀實文學《蘭台遺卷》。在這本書裡，我採用了偵探小說的手法，通過挖掘英國駐香港主教何明華 (Ronald Owen Hall) 的生平故事，揭示了一個重要主題：銖必離 (Jubilee) 的涵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何明華在香港激動地宣稱，「上帝讓中國準備了六千年，就是在等待著這一輝煌時刻的到來。我相信，在共產黨的治理下，這粒種子必將成長為參天大樹！」面對人們狐疑的目光，他進一步闡釋：「基督教終止了奴隸制，但卻無力阻止另一種罪惡，即財產私有化的集中。而私有制總是會導致貧窮，它不但是太平天國的起因，也是國民黨垮台的因素，也許，上帝搬出來共產黨，恰恰是為了要摧毀這一罪惡？」

多年後，我終於理清了他這種思想的來源。在《聖經舊約》「利未記」的篇章中，早已寫明了 Jubilee 這個概念。我在《蘭台遺卷》中把這個字眼譯為「朱碧麗」，為賞心悅目之故。但我的中國朋友劉傑醫生建議說，也許翻譯成「銖必離」更貼切。的確，那個英文詞匯所代表的是：每隔50年，必須對全社會的財產進行一次重新分配，歸還土地，免除債務，解放奴隸。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會有眾多在中國出生成長的西方傳教士及其後代，會像何明華主教那樣，熱烈歡呼「土改」。上世紀六十年代，在華出生成長的一批傳教士子女攜手運作，在加拿大朝野共同努力，呼籲推動與中國建交。因為在他們眼中，傳教士歷經數代人，辛苦奮鬥了百年，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貧窮落後面貌，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大刀闊斧、短短幾年間就得以實現了。在他們眼裡，土地改革、集體所有制、工商業改造、知識分子下鄉、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教育改革，均為「銖必離」的實踐。

《聖經新約》中「使徒行傳」篇記載，兩千年前的基督徒，在耶穌離開後，曾按照其旨意，過著「消滅了私有制」，「按需分配」的共產式生活，但也未能長久。人性是自私貪婪的。缺乏堅定的信

仰，很難維持任何高尚的理念。

但有極少數人，至今未放棄高尚。我在《蘭台遺卷》裡，介紹了這一現象。16世紀歐洲基督教會分裂後，產生了胡特萊德派 (Hutterites) 信徒。19世紀時，因遭受排擠迫害，僅餘一百多人。他們移民北美後，堅持過著消滅了私有制、按需分配、吃大鍋飯的共享式生活。這種集體運作方式，力量遠超周圍的私有制小農莊，因而不斷發展壯大，迄今已發展為五萬人、480家獨立的公社，絕大多數分布在加拿大西部平原上。

資本主義制度，無疑背離了西方文明的奠基石《聖經》中說教、背叛了基督教原始社會主義的核心理念。為了滿足貪婪和私欲，西方政客早已篡改了「銖必離」的本意，把「50年一次再分配」的金科玉律徹底庸俗化了，衍變為「金婚紀念」、「終身成就獎」等世俗涵義，故意扭曲了其深刻內涵。今天的年輕一代，已鮮少有人知曉「銖必離」的本意了。大約在2000年時，多倫多的一批年輕人曾試圖掀起一場運動，要求踐行「銖必離」，卻因上層人士的反對，未能成功。

按照馬克思的預言，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必然會轉為社會主義。西方某些國家，如北歐，事實上已經採取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多項舉措，基本上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但他們卻堅決不肯承認其實質，而中國幾十年來無論付出了何等代價、何種犧牲，西方陣營永遠會採用貼標籤、潑污水、耍雙標等卑劣手段，言必詆毀「共產中國」，指鹿為馬。此種行徑，可謂出賣了耶穌的猶大，卻指控別人是叛徒一樣。

這就涉及到了一個問題，誰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誰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許，「銖必離」的概念，恰是真假美猴王的試金石，也是戳穿偽君子的一柄利劍。

人類的理想標準，在本質上相同。從《聖經》中「銖必離」的制定，到中國古代先賢警示的「不患貧、患不均」，再到馬克思對消滅私有制的論述，人類亙古的追求，無不是社會的平等公正。

真正的基督徒，會成為真正的共產黨，除了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香港主教何明華，還有我們熟知的在太行山上救死扶傷的白求恩大夫，有

我撰文介紹的在 1937 年去延安採訪了中共領袖的美國學者畢森 (Thomas Arthur Bisson)、還有出生在四川的加拿大傳教士後代文忠志 (Stephen Lyon Endicott) 教授等。

《蘭台遺卷》完稿後，我理解了意識形態糾紛的癥結所在，從此不再困惑了。人類的生存發展，需要文明互鑒。正如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汲取融合了各民族優秀文化，因而得以豐富壯大一樣，地球上不同村落的人民，唯有擯棄偏見、面對事物本質，方能攜手步入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

■：以上您談到有效推進中西文化交流策略，歸納一下包括：化繁為簡將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以生動簡潔的故事講述出來；要對自己的語言文化自信，找到中西文化共通的切入點，在世界文化平等互鑒的視野下進行交流。人們認為以英語創作的華人華裔作家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有更強的能力。您立身海外進行文學創作，成為北美雙語創作的一支獨特力量、跨文化交際的重要力量，您覺得海外華裔作家英語創作面臨的最大挑戰或者困境是什麼？您對海外華人華裔作家突破這個困境並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有何建議？

□：八、九十年代時，海外華人很少有人用英文創作，即便有，在主流社會獲獎、引起關注的，也是極少數。首先，能熟練運用英文寫作，是必須的技能。其次，對題材的選擇、對文學的感受力、人生閱歷、視野的開闊、對人性複雜性的深邃領悟等等都會影響到創作以及作品發表後所受到的關注程度。當然，也有技巧的問題。譬如西方讀者習慣的線性寫作，如何刪繁就簡，達到閱讀流暢等等。

有人誤以為，只要寫了苦難歲月，就一定會在主流社會獲獎。這種看法並不全面。九十年代在加拿大與我幾乎同時期，在幾年之內先後用英文創作長篇小說或者紀實文學的華裔女性有好幾位，例如葉婷行的《苦風孤葉》，黃明珍的《神州怨》，趙廉的《虎女》等等，雖然大家的作品都涉及到或者圍繞著文革那段歲月，有的還上了暢銷榜，但這幾部作品中，只有《紅浮萍》獲獎。這也證明，題材因素雖然不可忽視，但更重要的，還是文學藝術本身的感染力。

也有些人只用中文寫作，並擅長運用華麗的辭藻，然後讓其他人把自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這樣做的效果好壞，取決於翻譯家對中文、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以及雙方讀者對文學的欣賞習慣都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掌握全域，恰當地進行取舍處理。而一個翻譯家的英文再好，假如缺乏上述條件，其實也很難幫助翻譯作品成功進入廣大西方讀者的視野。

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作家本人具備了用中英文兩種語言都能創作的的能力，可以親自處理素材，進行增刪剪裁，而非依賴他人的刀斧。因為依賴他人，會有太多不盡人意、卻無可奈何之處。例如，怎樣針對不同讀者的閱讀習慣進行增刪處理的問題。但即便是被國內作家奉若神明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也曾被一位中國旅美作家嚴詞批評拒絕過，只因葛浩文在翻譯英文時隨心所欲進行處理，包括把原作的悲劇結尾改為喜劇等等，大大激怒了原著作者。

新世紀以來，海外不斷湧現出更多年輕華裔移民採用英文寫作，並發表了作品。但我覺得，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快餐文化影響到了全球各族裔人民。人們對純文學作品的閱讀興趣似乎越來越低了。英文寫作的目的更多的是用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傳遞信息，因此很多時候已經淪落為實用的生存工具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狀況。也不必為文學的式微而嘆息。

我一直提倡今天的年輕人能夠在母語之外，至少熟練掌握一門外語，以便能及時有效地與世界溝通。這對增強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塑造是極為有利的。沒有外語溝通能力，就好像啞巴，失去了話語權，只能任憑他人造謠污蔑、陷害打擊，卻毫無開口還擊、澄清事實之力。當然，這種建議與文學無關，與國家命運卻息息相關。

■：您這其實是對中國國內高層次英語教學提出了極富意義的建議——學好英語及時正確地與世界溝通，以英語創作和恰當的翻譯來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當然，英語文學創作是最生動最能影響到廣泛人群的一種溝通形式。事實上，在多達上百位的北美華裔作家裡，不少作家採取了一種創傷敘事和中西二元對立的排斥性寫作，對過去的經歷一概採

取批判立場。這從整个人類的文明史來看，無異於固化西方對東方的刻板印象，也無益於發展的世界融合。而就有這樣為數不多的作家，如1981年出版*Spring Moon*的作家Bette Bao Lord（包柏漪），以一種對中西文化感恩的心態進行創作^[8]。近三十年來，您的創作一直以這種中西文化融合的方式，力圖打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壁壘，以細膩敏感的眼光發現兩者的相通之處，贏得了中西世界讀者的肯定和歡迎。這種寫作策略我認為對於當下紛爭頻仍、衝突不斷的世界，無疑更具有建設性意義，對於促進不同民族人民的相互理解、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非常感謝您分享了寶貴的中英文創作、翻譯、中西文化交流的切身體會。期待您在文學創作、翻譯等活動中為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貢獻。

[1] 《過雪山草地》原文：「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扎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越堅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

[2] 牛貴琥：《古代小說與詩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頁。

[3] 陳璇：〈偵探外衣裡的詩心——旅美華裔作家裘小龍訪談〉，載《長江學術》2016年第1期。

[4] 易淑瓊：〈走不出的意境——華裔雙語作家李彥《紅浮萍》中文譯寫本的詩性語言書寫策略〉，載《名作欣賞》2012年第36期。

[5] 李彥：《紅浮萍》（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312-313頁。

[6] 陳世驥：《陳世驥文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頁。

[7] 李彥：《海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43，258頁。

[8] Bette Bao Lord, *Spring Moon* (New York: Avon Books, 1981), p.457. 在《春月》的作者後記裡，Bao寫到：My latest blessing was to have been able to complete one full cycle of my destiny with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my lifetime. It began with my birth in China; then continued in America, now home; and culminated in a most propitious return to

the land of my ancestors.

注：文中提到的英文小說例句均來自：

Yan Li, *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Toronto: Sister Vision, 1995)

Yan Li, *Lily in the Snow* (Toronto: Women's Press, 2009)

Bi-lingual Creation, Translation, and Sino-Wes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Chinese-Canadian Writer Yan Li

Yu Xiaomei (China),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Yan Li (Canada),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with Chinese-Canadian bilingual writer Yan Li consists of three major parts. It begins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she names her novels and characters, and focuses on how and why she introduces and integrates Chinese poetry into fiction creation. Her answer to the two questions serves as a convincing proof that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which passed down from the ancient times has influenced her fiction writing and it also proves the inter-connections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and the overseas fiction creation, the production of a hybrid world literature at large. The interview thought-provokingly touches upon the current plights of writing in English context and possible prospect for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to win a place on the world literary stage. What else are illustrated are the effective translating techniqu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approaches in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e interview makes it clear tha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Sino-West cultures is possible through positive integration of best Sino-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legacies.

Key Words: Chinese-Canadian writer Yan Li's bi-lingual creation and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better Sino-West cultural communication